

从书写—印刷话语网络到数字话语网络*

——当代中国文论的话语构型机制

□ 单小曦

内容提要 “话语网络”对应的是文论话语生成的“构型”机制和生产逻辑。借鉴福柯的“知识型”和基特勒的“话语网络”研究，可以将文论话语网络视为一个时代参与文论话语意义生产的媒介系统或网络整体性运作机制。1978年以来的当代中国文论领域，主要存在着书写—印刷话语网络和数字话语网络两大话语网络。当代中国文论的十多种代表性文论话语都以书写—印刷话语网络为构型“主导”，形成了客观物质实体性文本、条块分割的文艺与文论话语交流方式，现代性和建设性后现代性文论话语范式得以构建。新媒介文论话语以数字话语网络为“主导”，生产出了非实体性的数字文本、网络交互界面、灵活和互动性更强的数字化传播平台，而这一切正在推动中国新媒介文论走向数字现代性的文论话语范式。

关键词 当代中国文论 书写—印刷话语网络 数字话语网络

作者单小曦，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艺批评研究院教授。（杭州 311121）

四十多年来，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生产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对照“三大体系”要求和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发展建设目标，仍任重而道远。为了能对当代中国文论及其未来建设进行更为充分、深入、有效的研讨，笔者提出一种“话语形态—话语范式—话语网络”的反思和研究模式。这一模式中，“话语形态”“话语范式”“话语网络”分别对应着文论话语的整体面貌、内在基质和“构型”机制。按照此前的研究，笔者提出，1978年以来当代中国文论发展中出现了人学文论话语形态、审美论文论话语形态、价值论文论话语形态、形式论文论话语形态、中国古代文论现代化文论话语形态、文化诗学文论话语形态、文学伦理学文论话语形态、中国阐释学文论话语形态、后学文论话语形态、生态论文论话语形态、知识社会学与文化研究文论话语形态、文艺人类学文论话语形态、文学地理学文论话语形态等十多种代表性文论话语形态。（单小曦，2025a）其中，前8种话语形态属于现代性文论话语范式，后5种话语形态属于建设性后现代性文论话语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新媒介文艺研究”（18ZDA282）、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媒介文艺的‘中国图像’研究”（22BZW196）阶段性成果。

式。而这十多种话语形态和两大话语范式，都是以书写—印刷文艺现象为研究对象建构起来的。其中有少数话语形态，如形式论文论话语、知识社会学与文化研究文论话语，虽看到了模拟性电子媒介兴起后当代文艺的发展变化，提出了文论话语的视觉或图像转向、文化研究转向等主张，但整体上并未超出现代性、建设性后现代性的文论话语范式。相对而言，笔者主张把模拟性电子媒介时代及该时代出现的视觉化和图像化文艺现象与数字（数智）时代及该时代特有的数字（数智）新媒介文艺现象区别开来，倡导建设和发展针对新媒介文艺现象的新媒介文论话语形态。（单小曦，2025a）新媒介文论话语形态既不属于现代性范式，也不属于建设性后现代性范式，它独立构成了以“数字现代性”为基本属性的新型文论话语范式。（单小曦，2025b）

本文的任务是继话语形态、话语范式研究后，进入“话语形态—话语范式—话语网络”模式的第三个层次和环节——“话语网络”，研讨当代中国文论各种话语形态和话语范式得以生成的“构型”机制、生产逻辑。总体而言，1978年以来的当代中国文论主要存在两大话语网络，即书写—印刷话语网络和数字话语网络。正是在书写—印刷话语网络“主导”下，才型塑出了现代性、建设性后现代性两大文论话语范式及其所属的十多种文论话语形态。而在数字话语网络“主导”下，数字现代性文论话语范式及其所属的新媒介文论话语形态也才得以构建。

一、从“知识型”到“话语网络”

本文所说的“话语网络”，借用的是德国媒介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edirch Kittler）所使用的术语“aufschreibesysteme”（记录系统）的英译词“discourse networks”。英译者采用这一翻译旨在强调基特勒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对话关系。基特勒的“话语网络”对应的是福柯的“知识型”。福柯使用“知识型”试图揭示人类历史上各个阶段知识生产的基础条件，即“知识空间内的那些构型（les configurations），它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经验知识。”（米歇尔·福柯，2001，第10页）如果话语具有存在性地位，人类的一切知识生产都表现为话语，“知识型”也就必然是话语“构型”，“它是当我们在话语的规律性的层次上分析科学时，能在某一既定时代的各种科学之间发现的关系的整体。”（米歇尔·福柯，1998，第214页）需要强调的是，有人把福柯的“知识型”混同于库恩的“范式”，这是不恰当的。在谈及知识的非连续性问题时，福柯说：“不是理论形式变了（范式更新或对系统整体的修改）。问题在于是什么在管理（govern）陈述，……这是体制的问题，是科学陈述的政治性问题。”（米歇尔·福柯等，1991）尽管福柯在提出“知识型”时还没有挑明它的权力属性，但思考“什么在管理陈述”亦即话语制度问题在这里已经开始，而“话语制度是政治的”，“范式是认识论的”，（Giorgio Agamben, 2009, p.14）即思考范式和探究“知识型”具有完全不同的理论视角和理论旨趣。前者是按认识论思维进行的“话语是什么”的基本属性研究；后者则是按制度、权力等话语得以形成的政治视角进行的“话语如何是”的构型机制研究。这也是笔者讨论话语范式和“话语网络”（包括“知识型”）所持的基本立场。正是从话语制度出发，福柯提出，“文艺复兴‘知识型’”以“词”与“物”之间的“相似性”原则进行知识话语生产；“古典‘知识型’”抛弃了“相似性”，以“同一与差异”或“表象”原则进行知识话语生产；进入19世纪的“现代”，现代性意义上的“人”占据了知识话语构型的核心位置，一切知识话语生产都被置于“人之死”这一限定原则之下。

基特勒的“话语网络”继承了福柯“知识型”的话语构型、话语制度概念内涵，同时也对之

构成了一种严峻挑战。在基特勒看来，福柯不过是图书馆里的知识考古学家，他只停留于书写—印刷文化，只着眼于文字符号、语言文本来考察话语，探究“知识型”。然而，“书写本身也是一种技术媒介（techological media）”，它对文字表意具有基础性的建构作用，“知识考古学家却完全忘记了这一技术的存在。因此，在其他媒介进入图书馆书库之前，他的所有分析都已经崩溃瓦解。（他的）话语分析无法用于声音档案或成堆的电影胶片。”（Friedrich A. Kittler, 1999, p.5）即如果只从文字资料、编目文献层面进行知识考古，而不考虑渗透其中的技术力量亦即媒介的物质建构功能，这种话语、“知识型”阐释都是在搭建空中楼阁。特别是20世纪后，电子录制和存储技术挑战了传统手写和古登堡机械印刷复制技术的统治地位，人类文化生产和话语实践进入了新的时代，一种超出福柯“知识型”的新话语构型已经诞生。按波斯特的说法，“新兴的支配形式根本不是语言行为，而是语言设定（formations），是对象征符号的复杂操纵”。（Mark Poster, 1990, p.87）为了能够充分说明问题，在研究者和译介者的推动下，基特勒接受了“话语网络”概念，并主张以此代替“知识型”。所谓“话语网络”，指“允许特定文化选择、存储和处理相关数据的技术和机构……所有图书馆都是话语网络，但话语网络并非都是图书。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随着信息流的自动化，话语分析已经不能穷尽所有知识与权力的形式。当下的考古学必须把技术媒介中的数据存储、传输与计算也考虑进来。”（Friedrich A. Kittler, 1990, pp.369-370）即同为话语构型，“话语网络”不同于“知识型”最突出之处在于，它锚定的不是语言、文字、书写、文献等书写—印刷文化的符号文本属性，而是“数据流”（data streams）的计算、传输、存储技术与机构及其对话语的建构功能。从这种认识出发，基特勒分析出了三种“话语网络”，即中世纪末到1800年间的“学者共和国”、19世纪的“话语网络1800”、20世纪的“话语网络1900”，其后继者还提出过“话语网络2000”。按此划分，福柯的“文艺复兴‘知识型’”和“古典‘知识型’”都被划入了“学者共和国”，“现代‘知识型’”对应的是“话语网络1800”。福柯一笔带过式地提到“后现代‘知识型’”，勉强可以和“话语网络1900”形成对应。

基特勒“话语网络”突出了福柯“知识型”忽略但现实存在的物质条件——技术和机构，应该说是一种理论推进。不过，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不应把话语网络仅视为来自技术和机构两个要素的构型力量，也不能以技术和机构代替语言文字、文本文献来解释话语构型。话语网络中“网络”一词已经表明，它是多种媒介要素叠加复合、交织成网、协同生产的机制。笔者一直坚持认为，文艺生产实践中的媒介总是复数性的媒介系统，具体包括语言符号媒介（口语、文字、色彩、线条、形状等）、载体媒介（承载语言符号的声波、甲骨、纸张、画布、屏幕、计算机软硬件等）、制品媒介（册页、书籍、光盘、网页等语言符号与载体相结合的制造物）、传播媒体（出版社、影视公司、网站、自媒体等制作传播信息的机构和平台）、技术媒介（发声技巧、书法、印刷技术、电子技术、数字技术、大数据技术等渗透在前三种媒介层面中的技巧、技能、技术）等多种层次，它们复合运作，同时将不同主体、语境、世界等连接、聚集和接合在一起，形成文化意义生产活动和生产机制。^①传播学研究一般把人类信息传播史分为五大阶段，每一阶段分别以一种主导媒介来命名，即口语媒介时代、文字媒介时代、印刷媒介时代、电子媒介时代和数字媒介时代。（熊澄宇，2011，第4页）其实，这五大时代亦即口语符号媒介、文字符号媒介、印刷技术媒介、电子技术媒介、数字技术媒介主导下各个媒介系统复合运作生产意义的时代。显然，从媒介类型上看，被基特勒强调的技术媒介自印刷技术诞生后就获得了主导性地位，而福柯以及

^①更详细研究参见单小曦：《新媒体文艺生产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72~79页。

所有缺乏媒介维度来阐释话语的理论家所看中的文字符号、文本文献也一直是话语构型媒介系统和网络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它们都是在整体性的媒介系统和网络化运作中才能具体发挥建构功能。总之，话语网络当指一个时代参与话语意义生产的语言符号媒介、载体媒介、制品媒介、传播媒体和技术媒介共同构成之媒介系统或媒介网络的生产运作机制。

这样，我们可以提出比福柯和基特勒更为阔大且涵盖全部人类文化发展史的三大话语网络或媒介“文化型”——口传话语网络、书写—印刷话语网络、数字话语网络。之所以把书写和印刷合并到一起，是因为两者具有明显的连续和推进关系。而电子媒介主导也难以创造一种独立的话语网络，因为上述五大媒介和五大发展阶段意义上的电子媒介（不同于包含了数字媒介的广义电子媒介）不过是数字媒介的先声，在文本上仍保持原子固态实体性，在信息生产与传递上它仍保留着旧的类比方式（不同于数字计算方式）和印刷大众媒介时代发展起来的少数人制作向大多数人“播放”的模式。以此视野观之，福柯的三大“知识型”和基特勒的“学者共和国”“话语网络1800”都属于书写—印刷话语网络；基特勒的“话语网络1900”及其后继者们所说的“话语网络2000”大致可以划入数字话语网络。人类各个历史时期的话语都是上述不同话语网络或媒介“文化型”中的具体生产，而作为具体话语类型的文论话语也包含其中。

口传话语网络、书写—印刷话语网络、数字话语网络贯穿了上万年甚至几万年人类文化发展史。在具体发展过程中，它们不是一个代替另一个，而是形成了一个不断积淀和叠加的过程。福柯在研讨“知识型”时，站在后结构主义立场强调了不同“知识型”之间的非连续性或断裂性关系。基特勒在谈论话语网络时，淡化了福柯的断裂思维。相对而言，也许雷蒙·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关于文化发展中所说的“主导、残余与新兴”关系，更符合不同类型话语网络的历时发展现实。无疑“主导”性话语网络在生产话语形态和范式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起关键作用，但不能就此忽视积淀和渗透在其中的“残余”和“新兴”的话语网络因素。“残余乃是有效地形成于过去，但一直活跃在文化过程中的事物。它们不仅是（也常常全然不是）过去的某种因素，同时也是现在的有效因素。”（雷蒙德·威廉斯，2008，第130~131页）“新兴”是“主导”话语网络中不断被创造出来可能生成新话语网络的新关系、新类型、新价值等因素。“主导”要在现实中发挥作用，需要形成对“残余”和“新兴”的“收编”（incorporation）。显然，“主导”“残余”和“新兴”是一个动态转化过程，现在的“主导”时过境迁后就变成了“残余”，现在的“新兴”未来就可能成长为“主导”。就作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构型机制的话语网络整体情况而言，一个时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书写—印刷话语网络，当代中国现代性和建设性后现代性两大文论话语范式及其所属的各种文论话语形态都主要来自这种话语网络的建构。不过目前书写—印刷话语网络的“主导”地位已经岌岌可危，曾经作为“新兴”的数字话语网络正向“主导”迈进。而作为“残余”的口传话语网络在书写—印刷话语网络中只是苟延残喘，在数字话语网络中却焕发出了新的活力，沃尔特·翁的“次生口语文化”研究和麦克卢汉的“重新部落化”研究都指明了这一点。我们还需看到，不同话语范式及其中的话语形态背后起作用的话语网络具体制约过程也表现不同，它们之间具有不同的复杂关系。对于现代性、建设性后现代性范式中的各种话语形态而言，以书写—印刷话语网络为“主导”，作为“残余”的口传话语网络和作为“新兴”的数字话语网络也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对于新媒介文论话语而言，当前也受到了书写—印刷话语网络的建构，但主要构型力量则来自数字话语网络。换言之，当前数字话语网络已经构成了新媒介文论话语构型机制的“主导”，书写—印刷话语网络正在从新媒介文论话语构型

机制的“主导”走向“残余”的途中，但仍对新媒介文论话语构型发挥着一定的影响。

二、书写—印刷话语网络：当代中国文论话语构型“主导”

当前，书写—印刷话语网络是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主导”性话语构型机制，同时也构成了中国新媒介文论话语的“残余”性构型力量。

要充分理解书写—印刷话语网络的特点，需首先引入作为文化“残余”的口传话语网络作为参照系。口传话语网络即中西方文字发明前的人类话语构型或文化型，具体表现为口语符号主导下包括声波载体、身体载体、表情符号、发音技巧等协同生产的话语构型机制。著名的“帕里—洛德”理论在研究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人类早期史诗“创作”特征时，较早触及了这一重大问题。作为一种文字书写无法再现的原生口语文学，史诗表现为表演者和观众在“部落化”场域中的活态交流活动，其文本具有一次性或不可重复性的特点。为了完成每一次创作，诗人需要依靠一套主要诉诸记忆且口耳相传的程式化手段，具体包括“六部格诗行”的选词原则、“标准化的套语和陈词”“标准化的主题”和其他“预制构件”等。其实，这种情况超出了史诗叙事类文学范围，在中国古代的口语诗歌如《诗经》中也有着充分的表现。正是后世文字书写时代文人创作所不屑和鄙夷的“陈词滥调”和程式，构成了口传文学话语生产的必需手段。（Albert B. Lord, 1971, pp.30-67）哈弗洛克（Eric A. Havelock）认为，荷马时代“这种在记忆中重温经验的方式”，而不是文字发明后的“分析和理解”式思维方式，对于开始接受文字书写文化型的柏拉图而言，就是“敌人”。（Eric A. Havelock, 1963, p.45）因此，柏拉图把诗人逐出“理想国”的原因并不是表面上的诗人“说谎”，深层次上的原因是他无法接受口传话语网络。“荷马时代的希腊人重视陈词滥调，不仅是诗人如此，而且整个口语知识界或思想界都依赖于这种程式化结构来构建思想。在口语文化中，知识一旦获得就必须不断重复，否则就会丢失：固定的、程式化的思维模式对智慧发挥及其有效性至关重要。”（Walter J. Ong, 2002, p.24）远古时代全部话语、思想、知识都是按照这样的话语网络进行生产的，这里自然包括关于早期文学的谈论，即对应后世文论文话语的口语文论话语。具体言之，口语文论话语是受作为谈论对象的文学程式和自身套语陈词双重制约的产物。

书写—印刷话语网络完全不同于或者完全相向于古老的口传话语网络。书写—印刷话语网络是在文字书写基础上，经由书写和印刷技术联合主导，由语言文字符号，石头、甲骨、羊皮卷、纸张等载体，册页、书籍等制品，以及抄书、刊刻作坊、现代出版印刷机构、书店、图书馆等协同生产话语的构型机制。书写—印刷话语网络的特殊性主要来自文字书写和印刷技术联合主导媒介系统的生产方式。文字书写可以使头脑意识以符号形式外化到各种载体媒介上，形成一种脱离现场交流环境的独立存在的客观物质实体性文本。这种文本不仅仅表现为文字符号的交织，而且还内在包括各种载体以及文字符号与各种载体通过制作技术制作而成的制品媒介。此类文本的物质实体性来自语言符号、各种物质载体及各种制品的结合效应。正是以这种文本的生成标志，不仅口语世界中在场性活态文本被打破了，同时也改变了话语的交流机制和传播形态，原来的“部落化”交流活动走向了终结。从此，一体化在场性的文学及文论话语交流活动被分为了三大阶段：一是生产者的创作或制作活动；二是传播者的传播活动；三是接受者的接受和消费活动。每一个阶段都以相对于口语互动生命世界的“僵死”文本为依托。“悖论的是，文本脱离鲜活的

人生世界而死去了，徒留僵死的视觉形象，但正是这样的僵死确保了它的永恒和复活的潜力，在众多读者活生生的呼唤下，它又可以复活成无限生动的语境。”（Walter J. Ong, 2002, p.80）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实践，文字书写和印刷媒介主导下的话语传播最终还是要通过交流得以实现，但不同于口语世界的整一活态过程，此时的交流不仅需要以分割出来的个体行为为前提，而且还需要经历一个制作文本——锁死文本——复活文本的过程。而作为话语生产者的每个独立个体的精力和创造力不再针对口语时代的交流对象，不再致力于现场互动，而是集中于这个文本，其成败得失也都体现在个体如何制作和破解这个文本中。在个体的头脑意识内部，记忆的地位被削弱，想象力、情感体验、理性沉思、逻辑分析等能力逐渐被建构起来，其重要性也逐渐上升。文字书写“使人产生日益清晰的自省意识，打开了心灵通向外部世界的大门。外部世界与心灵截然不同；同时文字还为内部心灵世界打开了通向自身的大门，使外部世界成为内部心灵世界的背景”。（Walter J. Ong, 2002, p.104）孤立隔绝的个体话语生产者走向内心、主观意识，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任意性和象征性空间，发挥创造性想象，虚构人物和场景，预设“隐含的读者”，而载体媒介向着轻便、光滑、可折叠等方面的不断进化，给文字修改和语言不断精致化提供了可能，同时篇章结构不断变得精巧而有法度，即个体文人、专业学者创作文学话语和文论话语时代到来了。

手工印刷术出现后，文字书写和印刷术叠加在了一起，文本的客观性、物质性进一步得到了强化。印刷术使文字从手工书写痕迹变成了统一范模印制，并被整齐划一地按线性和分层排列在一起，进而被制作成既具有权威性、神圣感又可以大量复制和广泛传播的书籍和报刊。“文字把词语从声音世界迁移到了视觉空间世界，而最后是印刷术把词语锁定在了此空间里。印刷术压倒一切的目标就是空间控制。”（Walter J. Ong, 2002, p.119）印刷术既形成了对文字书写形成的视觉空间控制，还进一步拓展出了行距、页边留白、索引、清单、图表及各种特别边框设计等组成的新物理空间，它们和语言符号的象征性空间结合在一起，为话语生产者意义编码、解码活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印刷术也使话语交流过程的条块分割程度进一步增强，使话语传播环节变得更多、更复杂，特别是到了现代机械发展阶段出现了经纪人、编辑、美工、排版等各种中介工种和从业者，话语发话主体和受话主体之间的距离被进一步拉远。这一切都为话语发话主体、传话主体、受话主体提出了新要求，即每一类主体都要在各自生产环节充分发挥主体性。发话主体积极致力于文本内部空间的搭建和开拓，不断改进意义编码技巧，文学本文不断走向独特、丰富、蕴藉、深邃、多意；文论文本进一步逻辑化、理论化、深度化、体系化。传话主体积极致力于文本二次创造和制品媒介的精细化生产，编辑、美工、排版、印刷精益求精。受话主体需不断提高“前理解”水平，调动智力、情感、理性和逻辑等能力，感受、体验、挖掘、反思文本，最终形成有深度的审美接受或理论阐释。在这一过程中，经典文学话语和评价标准得以确立，现代性文论话语范式（具体表现为观念模式和叙述模式）得以建构，后现代性文论话语范式也具有了解构对象和新建构的前提。

除了书写—印刷话语网络的一般性内涵外，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网络还有着自身的时代性特征，即它具体表现为积淀着书写—印刷话语网络一般性内涵的机械印刷话语网络。这种机械印刷的话语网络对包括新媒介文论话语在内的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具有更为直接的型塑力。机械印刷话语网络是在具有高科技特点的现代机械印刷技术主导下的语言文字、现代工艺纸、现代期刊图书及其编辑出版机构等协同生产文论话语的构型机制。需要指出的是，当前上述各种媒介类型也延

伸到了电子和数字技术、电子屏幕、数字化电子书、网站等领域。这种情况一方面进一步突出了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网络不同于传统或一般书写—印刷话语网络的当代品格；另一方面，这些新型媒介不过都是对现代机械印刷技术主导媒介系统中各种相应媒介类型的补充和延伸，并不具备后面讨论的数字话语网络中各种媒介形式的独立性，此时它仍未超出书写—印刷话语网络的大范畴。作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网络具体表现形式的机械印刷话语网络，形成于中国19世纪下半叶。中国自唐代发明手工雕版印刷术之后，手工书写和手工印刷不断整合，共同长期主导中国古代媒介系统生产。16世纪末，德国古登堡于15世纪中叶发明的现代机械印刷术传入中国，印刷术在中国传统媒介系统中的地位急剧上升。发展到19世纪下半叶，现代机械印刷术代替了原来的手工书写—印刷联合主导而单独发展成为媒介系统中的主宰，即书写—印刷话语网络的现当代形态——机械印刷话语网络开始形成。机械印刷话语网络的新特点主要源于现代机械印刷技术带来印刷生产效率的空前提高，及其推动的媒介系统内部诸媒介要素的变革及文学、文论话语的新变化。这里发生了一个尚未得到充分重视的连锁反应：机械印刷术的发展和生产效率的空前提高，催动了清末民初兴办报纸杂志和图书出版的浪潮，即媒介系统内传播媒体从手工刊刻作坊到产业化现代传播机构和制品媒介从手抄册页书籍到编排设计精致化的现代出版物的重大革命；清末民初的报纸杂志浪潮催动了史无前例的白话文运动（蒋晓丽，2005，第83页），即媒介系统内语言符号媒介从古典文言文到现代白话文的重大革命；白话文运动催动了西方文学的译介以及中国古典文学话语的终结和“五四”新文学话语的诞生；古典文学话语的终结和“五四”新文学话语的诞生催动了古典文论话语的终结和中国现当代文论话语的生成。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晚清以来以杂志和报纸副刊为中心的文学流派、文学社团的组织方式”消失了，（洪子诚，2002，第206页）其中也包括文论与批评话语阵地。但机械印刷主导下的媒介生产机制不仅被保留和延续下来，还在国家行政力量介入和主流意识形态支持下，进一步强化了。从1949到1978年，国家不仅认可了这种机械印刷媒介生产机制，而且将之直接纳入了计划经济体制之内，文学和文论期刊、图书的出版都被置于具有行政级别的文联、作协、高校、科研院所管辖之下，这样也就使之获得了经济和政治上的保障。1978年之后，先有思想解放时代精神的助推，再有市场经济消解计划体制和激发媒介生产力的双向涤荡，当代中国机械印刷媒介生产机制一度走向鼎盛。当然，从20世纪80年代末电视普及，到90年代网络兴起，再到21世纪从Web 2.0到Web 3.0的发展变迁以及人工智能、元宇宙浪潮来袭，当代中国的印刷媒介生产机制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和冲击，但因其具有书写—印刷话语网络积淀出的千年牢固根基以及70多年来社会制度、文化教育体制的支持，今天它依然坚挺，并内在构成了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生产主流的深层构型机制。

当前，书写—印刷话语网络构成了当代中国十多种代表性文论话语的“主导”性构型力量，同时也以其“活跃的”“有效的‘残余’”身份在对新媒介文论话语发挥着建构作用，也单独形成了一定的后果。比如，今天的很多新媒介文艺研究成果，仍是以纸媒印刷性的专著、论文在出版发表，中国的学术体制在成果认定上，仍以这种形式为评判依据，而发布于各种网络平台 and 以数字形式出现的成果常常被轻视、忽视甚至不给予承认。

三、数字话语网络：“主导”构型新媒介文论话语

今天，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生产整体角度而言，数字话语网络还处于不断生成的过程之中，

正走在成为“主导”话语网络的途中。它以“新兴”身份参与了中国现代性、建设性后现代性等各种文论话语形态的生产。而对于中国新媒介文论话语而言，数字话语网络已经成为“主导”性的构型力量和机制。中国新媒介文论话语之所以形成一种以数字现代性为基本属性的独立话语范式，主要是数字话语网络型塑的结果。数字话语网络是由数字技术主导下的语言文字、图像、声音等符号，计算机软硬件、网络等载体，网页、电子书、数字艺术产品等制品，以及网站、自媒体等平台机构协同生产文论话语的构型机制。数字话语网络的特殊性主要来自数字技术主导下的媒介系统生产方式。

从话语信息生产的文本方面来看，数字技术主导的媒介系统生产出了不同于传统实体性文本的数字化文本。书写—印刷以及模拟性电子媒介主导的信息生产主要是以类比和再现方式进行的，具体即按照类比和再现法则将信息符号化，再把符号置于载体媒介之上并进一步加工为制品媒介，通过媒体传播给接受者，从而完成信息生产过程。相对而言，数字技术主导的信息生产最关键之处在于实现了信息数字化，即一切信息都被转化为可识别的二进制数字“0”和“1”，以计算方式对其进行加工、传送、存储、还原。符号化、载体化、制品化和媒体传播每个环节都不再是单纯类比和再现，其更底层的运行逻辑是计算法则或算法。无论是类比再现还是计算方式，都需要利用对象构成数据的连续性和离散性来实现。比如语言符号文本是由可离散的句子、词语、词素等不同单位构成的连续体；模拟性电影胶片是以“帧”为单位可离散的图片连续体。连续性以离散性为前提，没有离散性就无法完成以类比再现为法则的连续性整体。此处的问题是，在书写—印刷和模拟性电子媒介中，上述单位、样本的离散性呈现并未被进一步量化，即并未被赋予某一特定范围的数值。它以混沌的原子性物质实体形式出现，信息连续体一旦形成，就成为样本顺序不可更改的整体凝固物。现代大规模机械复制的就是与这种凝固物“模板”一模一样的副本。数字化信息生产则完全不同。它首先通过“采样和量化”两个步骤“将连续性数据转化为数值化呈现”。（列夫·马诺维奇，2020，第28页）比如用一个像素网格代表一个数字影像，即采样；比如在一个8位的灰阶图像中，数字范围被确定在0到255之间，即量化。采样与量化造就了可计算的“模块化”新型离散性，此时信息连续体以短小自足的模块为单位。更为关键的是，这里的模块不再是混沌一体的原子性物质实体，而是高技术化、可编程的计算程序，它自身是独立的，彼此间又通过算法形成连续性整体。而在此连续整体中，任何模块（程序）都可以随时获取、修改、替换、添加和重组，一种流动性、多变性、易变性、无严格边界、可随时超链接且即时性在线的数字文本（界面）诞生了。这种模块化和可编程的离散性是数字话语网络生产的底层逻辑，以此形成的数字文本（界面）是数字话语网络生产的关键成果。如果对这一成果做进一步的哲学追问，可以将之视为“数字物”（Digital Objects）。“数字物”既不同于被传统形而上学解释为质料和形式统一的自然物，也有别于控制论、一般技术哲学认定的作为“自组织系统”的技术物。当然，数字物首先已经是技术物，一般技术物的“自反性”“自创生性”都是存在的。同时，数字技术已经使这种“自反性”“自创生性”走向了智能化。究其根源，还在于计算的性质。有学者认为，就像人有意向性一样，算法也应被看作存在着一种意向性。计算起源于衍生，计算衍生的语义是不同于自然语言的纯粹语义，“计算数据就像感官材料一样，应被当作意识流，……此处我们可以看到元数据，元数据方案与数码（字）物之间的重要联系，在算法的意向性下，元数据方案作为范畴，从数据流中创建客体形式，从而向我们呈现数码（字）物。”（许煜，2019，第82页）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数字物的数字文本实质是智能化文本。从内部结构看，数

字文本（界面）包括“文化层面”和“计算层面”两个基本面。前者处于上层，主要表现为以概念、范畴、命题和情感、想象、价值追求等表征传递人类知识、经验、价值观等，通过类比再现方式达成；后者处于下层，主要表现为计算机语言、数据结构、数据包、函数与变量等，通过搜索、匹配、分类、选择、删改、重组等计算方式达成。“这两个方面‘合成’在一起。这种合成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计算机文化，它把人类的意义与计算机的意义综合起来，既包括人类文化模拟世界的传统方式，也包括计算机呈现世界的独特手段。”（列夫·马诺维奇，2020，第46页）显然，文本的智能性主要来自计算层面。最重要的是，计算层面从根本上影响了文化层面，从话语形态到话语范式都因此而被改变。新媒介文艺话语文本和新媒介文论话语文本都是由这两个层面“合成”的话语文本。

从话语信息的载体和制品媒介生产环节及生产机制看，在数字技术的作用下，通过数字化的采样和量化，原来的纸张、书本等原子性载体和制品的物质实体形态都被打破了，并以符码计算方式转换为了计算机和网络交互界面。这样，考察话语信息的载体媒介和制品媒介的生产机制，就转变成了考察计算机网络交互界面如何制约话语意义生产的问题。20世纪的语言学早有关于语言媒介影响使用者对世界的认识和思维方式的看法。李普曼的“拟态环境”说较早考察了印刷媒介塑造人的世界观和关于世界的现象问题。在媒介生态学看来，“传播媒介不是中性的、透明的和无价值标准的渠道，只管把数据或信息从一个地方传送到另一个地方。实际上，媒介的固有的物质结构和符号形式发挥着规定性的作用，塑造着什么信息被编码和传输、如何被编码和传输，又如何被解码”。（林文刚，2007，第30页）这里的传播媒介应该包括媒介系统的各个层次和各种类型，自然包括数字化环境中取代此前载体、制品媒介的交互界面。在马诺维奇看来，使用增强版的“符码的非透明性”观点来解释人机交互界面形成的媒介偏向效果是合情合理的。理由如下：交互界面塑造了用户对计算机的想象及获取媒介对象的想法；交互界面剥除了原来载体和制品媒介的原有特征，并将自身的逻辑强加给它们；交互界面以自己的方式组织计算数据，为用户提供了不同的世界模式。这就是说，交互界面并非仅仅是进入计算机数据的透明窗口，更带来了自身的强大信息。此即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在计算机网络交互界面上的具体表现。就进入网络空间的文艺话语和文论话语而言，它们的“内容—形式（或媒介）”的关系已经被“内容—交互界面”关系所取代，原来承担制约内容、审美性、观念模式发生的形式、媒介建构功能就让位给了交互界面。就文艺话语而言，空间、时间、表面特定布局等维度给用户带来的特殊艺术体验，都来自交互界面的创造。“交互界面的一点点变化，就会导致整个作品产生巨大的改变。从这一点上看，如果认为交互界面是一个独立的、可以被随意更改的层面，那就是在抹除新媒体（介）艺术作品作为艺术的地位。”（列夫·马诺维奇，2020，第65~67页）就文论话语而言，新媒介文论话语不仅需要对上述情况给予讨论，话语信息生产、话语范式中的观念模式和叙述模式，也同样要被交互界面所建构和型塑。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存在先于交互界面、类似于传统书刊出版和发表的那种已经完成并定型了的文论话语内容，一切都是进入交互界面后同时生成的。在今天的数字技术环境中，当某一文论文本进入网络交互界面之时，就等于进入了一个由超文本系统构成的“文献宇宙”，此文论文本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文本块或文本片段，它与界面中早已存在的其他文本块之间是无缝链接关系，而不是传统图书馆和一本文论论著之间那种边界分明的关系。此时，文论话语意义的形成不再来自某个孤立的文本块，而来自整体的“文献宇宙”这一宏观背景，而且在具体实践中背景与前台也是无界限的，可以随时随地切换。即使就处于过渡状态

的印刷文论作品的数字版而言，今天已经可以通过文内、文外、网络等不同范围的搜索、复制、标记、格式转换、插入、评注等手段，将原来固定完成了的文本敲碎、分割、重写，甚至可以把“文献宇宙”中任何所需内容链接引入，文论内容或信息生产在此同步发生。这在纯粹数字化文论话语交互生产中更是明显，已不必赘述。

从话语信息的传播媒体这一生产环节和生产机制来看，原来的期刊杂志、图书出版机构已转换为网站、自媒体等平台。这样，话语初始作者即发话主体和传播者的地位降低了，中心化的话语权力关系一定程度上被消解了。发话主体的知识圈层被打破，一般公众、粉丝读者等都有获得文论发话主体身份的可能。同时，发话主体与受话主体之间的关系也从教化关系变成了平等对话关系，原来的各种固定身份可以互相转换，甚至在匿名、分身状态下同时存在。原来被书写—印刷传播分割为生产制作、传播、接受消费三个片段的话语交流过程，再次被整合为在线即时交互整体。“在全面的、无所不包的意识意义上，我们正在回归部落主义。”（Marshall McLuhan, 2003, p.129）“回归部落主义”不仅意味着个体意识支配的发话主体和受话主体又可以类似口传文化时代那样，通过虚拟空间实现及时在场互动，还意味着一种新集体意识的萌生和合作式话语生产方式的形成。新集体意识并不反对个体意识，而且反对排他性个体意识，主张在数字化存在状态下，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联合，以合作模式生产话语意义。首先，实现不同学科背景个体之间的在线合作，这里既包括打破不同人文学科之间的壁垒，也包括打破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之间的界限，例如文学艺术学科与计算机、信息技术学科之间不同学术主体之间的破壁合作；其次，实现不同身份个体之间的在线合作，比如学者、作者、编者、读者（欣赏者）等从不同角度进行的联合话语生产；最后，实现人类主体与“后人类主体”之间的在线合作，具体即人类主体和赛博格主体、人工智能主体等之间的联合话语生产。

四、结 语

按照笔者提出的“话语形态—话语范式—话语网络”反思和研究模式，话语网络处于该模式的底层。不同于话语范式那种在认识论思维下的关于文论话语“是什么”的基本属性研究，话语网络研究则考察“如何是”或如何生成的构型机制问题。沿着从福柯的“知识型”到基特勒的“话语网络”的研究脉络，笔者将话语网络视为一个时代中参与话语意义生产的语言符号媒介、载体媒介、制品媒介、传播媒体和技术媒介共同构成的媒介系统或媒介网络的生产运作机制。在当代中国文论发展现实中，书写—印刷话语网络是现代性、建设性后现代性两大话语范式及其诸多所属话语形态的“主导”性构型机制。由于这两大话语范式中的各种话语形态构成了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主流和主体，书写—印刷话语网络亦构成了整体性的当代中国文论话语构型机制的“主导”。书写—印刷话语网络的特殊性主要来自文字书写和印刷技术联合主导的媒介系统生产方式，它带来的是客观物质实体性文本、条块分割的文艺与文论话语交流方式，现代性和建设性后现代性文论话语范式得以构建。相对而言，数字话语网络构成了中国新媒介文论话语构型机制的“主导”。数字话语网络的特殊性主要来自数字技术主导下的媒介系统生产方式。在数字话语网络主导下，中国新媒介文论话语生产出了不同于传统实体性文本的数字化界面，以符码计算方式转换为计算机和网络交互界面和“数字物”，以及灵活和互动性更强的数字化传播平台，而这一切正在推动中国新媒介文论走向和成为一种独特文论话语范式。

参考文献:

1.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当代中国文学史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2. 蒋晓丽:《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5年版。
3. 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 列夫·马诺维奇:《新媒体的语言》,车琳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5. 林文刚:《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 米歇尔·福柯、阿莱桑德罗·冯塔纳、帕斯夸里·帕斯奎诺:《真理与权力》,陈荣钢译,搜狐网,网址:https://www.sohu.com/a/258528764_559362。
7.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学科考古学》,莫伟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8.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冯强、马月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9. 单小曦:《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形态及新媒介文论话语形态建构》,《艺术百家》2025年第1期a。
10. 单小曦:《数字现代性:中国新媒介文论话语范式》,《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b。
11. 单小曦:《新媒介文艺生产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
12. 熊澄宇:《媒介史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3. 许煜:《论数码物的存在》,李婉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14. Agamben G., “What is a Paradigm?”, in *The Signature of All Things On Method*, translated by Luca D’ Isanto with Kevin Attel, New York: Zone Books, 2009.
15. Havelock, Eric A., *Preface to Plato*,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16. Kittler, Friedrich A., *Discourse Networks 1800/1900*, translated by Metteer, M. & Cullens, 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7. Kittler, Friedrich A., *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 translated by Winthrop-Young, G. & Wutz,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8. Lord, Albert B., *The Singer of Tales*,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19. McLuhan, H. M., *Understanding Me: Lectures and Interviews*, edited by McLuhan, S. & Staines, D.,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2003.
20. Ong, Walter J.,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21. Poster, M., *The Mode of Inform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责任编辑 刘 洋